



王璐琪《我从小镇来》：

把名字还给具体的人

□舒辉波

每个时代，都在不断制造新的概念。今天，我们早已熟悉“小镇做题家”“留守儿童”“寒门学子”这样的名词。它们帮助我们迅速辨认一种群体，也帮助社会更有效地理解现实。这种概念的抽象，把无数不同的人归入了同一种叙述。

于是，我们越来越容易谈论某种群体，却越来越少想起一个个具体的人。

把抽象的“概念”写成具体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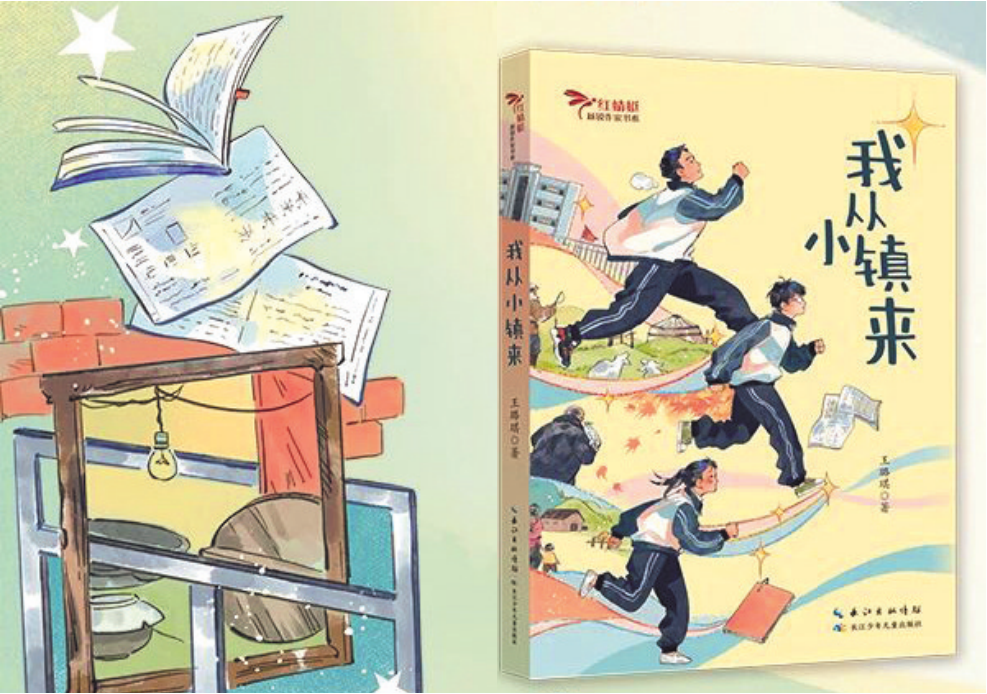
第一次读王璐琪的儿童小说《我从小镇来》，我几乎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入作品的。刘长明、贺兰、马红河三个孩子，来自被叫作“高考工厂”的陵坦镇中学。那里没有捷径，也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只能在日复一日的低头书写中，为自己悄悄种下一个够得着的远方。

读完这本书，我想到的是高考、教育，是城乡差异、阶层流动，也是这些年不断出现在公共舆论中的“小镇青年”。它们构成了小说的重要现实背景，也构成了许多人理解这部作品的方式。可是，当小说读完以后，让我难忘的是一个一顿要吃三碗米饭的少年，却因为婶子好心给他碗底放了个咸鸭蛋黄而换了一家饭馆。如果换一种写法，作者完全可以告诉我们：“刘长明自尊心极强。”一句话，人物便完成了。可是，王璐琪并没有这样做。社会学总希望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如此，它需要概括；文学却愿意先安静地注视一个人怎样生活。因为，一个动作有时候比一个概念更诚实。

刘长明冬天穿着露出脚踝的旧鞋，脚趾因为长期挤压而变形。班主任送来一双加棉的运动鞋，他没有立刻穿上，而是先把旧鞋悄悄藏起来，不愿意让老师看见。父亲出事，他一度动了偷钱的念头。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袖口沾满了羊毛，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拍打自己的衣袖。小说没有写他的自卑和良知的挣扎，只是从侧面写了这些微小的细节。

《我从小镇来》真正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给出了一套关于高考的解读，而在于它始终克制着不去给人物下定义。人永远比概念复杂，也远比各类解释更加丰富。这些细碎的行为，比任何标签都更贴近一个人的本真。

我很喜欢《我从小镇来》的写法，作家始终克制替人物解释自己的冲动：当一个孩子变得沉默，我们下意识地会寻找他的成长经历；当一个少年表现得敏感，我们会想要分析他的家庭环境，解释当然重要，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可是，文学有时候愿意停在解释之前。相信人物能够自己说话，也相信读者能够



《我从小镇来》，王璐琪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6年6月

自己理解，这恰是作家最大的克制与信任。《我从小镇来》虽然讨论的是高考，是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是家境贫寒的少男少女如何成长，却始终没有变成一本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书”。因为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具体的、血肉丰满的人。

我想起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境况》中谈及关于“Who”与“What”的区分。现代社会越来越擅长回答一个人“是什么”：学生、教师、贫困生、留守儿童。这些身份帮助社会管理，也帮助公共讨论迅速建立起共同语言。可是，它们终究回答不了另一个问题：他是谁？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一个人是“谁”，并不能由身份决定，只能在他的行动、选择和故事中慢慢显现。

《我从小镇来》中的重要细节，都在回答一个人“是谁”的问题：刘长明从来不等同于“贫困生”这个标签，他是会为一枚鸭蛋蛋黄调换座位吃饭的少年，是会把旧鞋悄悄藏起来的人，也是反复拍打袖口，最终站在拘留所外喊出“我走”的人。贺兰也不是“高考移民”，而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篮球，也不断寻找自己位置的少年。马红河不是“寒门女孩”，小说写了那口“补铁”用的大铁锅，写了她在下冰雹时冲向母亲的馄饨摊，写她剪掉长发陪妹妹顶着蘑菇头，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组成了她。

文学不反对概念，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

概念代替了一个人的时候，文学便开始沉默了。王璐琪始终在做另一件事情，她不断让概念停下来，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慢慢走到我们面前。

文学守护的，是不可替代的人

与其说《我从小镇来》的可贵之处在于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群像，不如说，作品没有让人物退回到概念里。他们的生命，已经摆脱了标签，重新拥有了自己的重量。于是，我们不再说贫困生、高考移民、寒门女孩，当一个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一个个人也就鲜活起来了。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人的身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实，而是在讲述中不断形成的。真正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是那些无可替代、无法复制的人生经历。文学讲述的不只是一种命运，而是这一种命运，为什么只属于这个人。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关于“注意”（attention）的看法。她认为，真正的“注意”，不是居高临下地理解别人，而是把自己的目光安静地停留在另一个生命身上，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样子慢慢显现。过去，我更多地把它理解成一种伦理学；今天，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文学。小说家为什么总要写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为什么总要停留在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一个细微的动作、一段漫长的沉默？因为真正的

■评论

孩童社交的“拼图式”体验

——读《这样说话就对了》

□冯致铭

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的“拼图法”教学，揭示了人际互动中“彼此依赖、共同完成”的本质。孩童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不仅身体上的成长至关重要，心理上的健康发展同样不容忽视。孩子从家人、朋友、老师，以及社会中汲取经验的阶段，如同完善他们的意识世界拼图的过程一般，需要正向的指引和积极的鼓励。凯瑟琳·纽曼的新著《这样说话就对了》便是一部教孩子们“在生活中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从而“建立良好关系”的引导型书目，帮助身心发育迅速的孩童掌握社交技巧，获得“拼图式”学习体验。

10岁至15岁的孩子正依赖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对外界进行有意识地探索。他们开始认识一个完整的自己，并领悟到关系的繁杂和世界的广阔。凯瑟琳尤其擅长从抽象的概念中抓住社交“拼图”的触点，从自我与他人两个方面帮助孩子们找到建立良好关系的接口。

凯瑟琳认为，“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体会或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独立自我人格的“排他性”要求我们每个人“只需要做最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刻意迎合别人”。一旦我们尊重自我、认清边界，便遵从自己内心，选择交朋友或享受独处。在肯定自我的同时，小读者可以跟随作家的语言探索人际交往的魅力：从学会打招呼 and 告别，到学会敞开心扉与人交谈；从学会泰然与人相处，到坦然面对棘手情况，一步一步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满足与充盈。作品开篇便给予读者自信：“其实你已经拥有了学习与他人建立联系所需的素质——同理心、好奇心和对他人的关心。”一颗心的振动可以引发另一颗心的共鸣。因此，这本书会教你如何

给予支持、成为盟友，进而关心社区、改变世界，“成为最好的自己”。

然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不能是刻板的说教，而是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说话就对了》采用的方法是让孩子们进行“体验”。“体验”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活动。在最基础的物理感知层面，作品采用32开书页，小巧灵活，方便随时查阅。绿色油墨印刷出多彩的画面，配合大小适中的字体，使读者可以收获愉悦的视觉体验。在更深层的意向建构层面，凯瑟琳温暖的风格、循循善诱的话语引导读者充实社交技能储备，以鼓励而非教育、邀请而非强制的方式将孩子们拉进一个真实而具体的场景，让他们“学会更加自信、清晰、流畅地表达，并给他们寻求帮助所需的勇气和方法”。

如“社交秘籍般”的语言表达和富有想象力的插画共同营造出一种兼具真实与乐趣的阅读氛围，为孩子们设计了“行为测试”“突击测验”“冷知识”等互动游戏环节深理解，通过“顺便一提”“继续阅读”等栏目引导他们的行动倾向。这一系列的体验式设计极大贴近了教育的本真，也是这本书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

“世界千姿百态，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作家通过《这样说话就对了》与每一位小读者悉心对话，不同的拼图都因充分的体验而趋于圆满。这本启发社交能力的童书获得市场认可，同时也完成了读者们的个性化实践。从“我敢说”的落落大方，到“我能说”的胸有成竹，从“尬聊”到“不尬”的游刃有余，到“交到好朋友”的以诚相待，那些聚集在孩子们心头的阴霾终会烟消云散，而那隐没的璀璨光芒，将照耀在他们亲手拼凑起来的小小世界。（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新书快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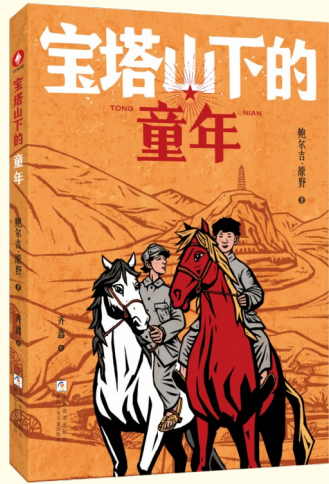
“不怕不怕”系列
秦文君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7月出版

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勇气的童话故事。故事主角是一只名叫“不怕不怕”的小鸟，名字虽然威风，心里却藏着恐惧。当坏猫多宝小九要毁掉鼯鼠甲的家时，小鸟鼓起勇气带领小伙伴们勇敢反抗，第一次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光。作品可以帮助小读者认识到恐惧并不可耻，学会在家人与朋友的关爱中接纳自我，慢慢积累勇气，理解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带着害怕毅然前行，最终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追赶队伍》
陶纯 著
希望出版社
2026年4月出版

关于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聚焦追赶队伍的“红小鬼”这一特殊群体的故事却较为少见。本书将镜头对准十岁年龄的孩子，他们没有跟随大部队伍行军，而是在队伍转移后，靠自己的力量走完了三千多里的追队之路。这个独特的切入点，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长征的全新视角。作品没有空洞的口号和刻意的拔高，有的只是一个鲜活、真实的孩子形象。



《宝塔山下的童年》
鲍尔吉·原野 著
齐鑫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7月出版

作品扎根抗战时期延安历史，通过讲述延安红星小学的蒙古族少年唐古拉和达瓦在军民守护下坚韧成长的历程，深挖延安精神内核，是一部饱含家国情怀、立足少年视角，兼具厚重历史底蕴与纯粹文学质感的儿童文学精品。希望小读者能从祖辈的童年故事中，学会珍惜当下的和平与幸福，在真实的生活体验中汲取力量，成长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胸怀家国的新时代少年。



《一样的不一样的》
梅子涵 著
【波兰】伊娃娜·奇米勒斯卡 绘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7月出版

1和2是一样的，都是数字。1和2又是不一样的，2比1多一个1，1加1才等于2，2减1又变成1。很多概念里，隐藏着看似一样，却又不一样的事物。当它们碰撞的时候，好像化学反应般生出更多有趣的故事。作品让小读者们看到世间万物充满生趣的连接和哲学意味，引发读者深思，编织出无限温暖、踏实又充满活力的美好生活故事。

■阅读札记

儿童参与——读『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

□王志庚



文马「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高洪波、马鹏浩、榆树下画、弯弯等绘图，中国和平出版社，2024年6月

高洪波和一群青年画家共同打造的“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以童谣为文化基因载体，以绘本为现代表达形式，成功构建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层对话机制。该作品系统阐释家国情怀、生命哲思，通过艺术创新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兼具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的优质儿童文化范本。

作品对经典童谣进行创造性转译，在保留民间文学精髓的基础上注入时代精神。《姥姥门口唱大戏》将皮影艺术转化为动态绘本叙事，通过现代绘画技法再现市集、田埂等传统生活场景，使儿童在视觉沉浸中理解“排队看戏”的民俗内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口传心授到可视化传播的质变；《12345，上山打老虎》突破童谣碎片化传统，构建起跌宕起伏的完整故事线，在老虎“炸毛”、野猪“石化”等创新情节中自然融入正义与友爱价值观，彰显传统文化符号的再生能力；《数字歌》首创“文字留白—图画补白”的互动机制，将抽象数字转化为采摘故事的可视化链条，显著降低了儿童理解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

系列绘本创新性采用“儿童参与式创作”模式。《12345，上山打老虎》《蔬菜谣》《会跑的床》三部作品均由儿童执笔绘制。画面中呈现的老虎毛发竖立、野猪伪装成岩石等造型，展现出未经雕琢的原生想象力；《蔬菜谣》中晾衣绳上飘动的衣物、烟囱与窗户的空间关系等细节，折射出儿童对生活环境的独特观察视角。《会跑的床》中非写实的火车造型与奇幻的乘客形象，传递出不受拘束的纯真审美。这种创作机制不仅践行了国际先进的“儿童参与权”教育理念，更通过艺术实践确立了儿童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地位，使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由儿童创造、为儿童存在”的文化样本。

作品将传统文化哲思转化为儿童可感知的叙事体系。《树爷爷的生日会》通过喜鹊送信串联动物社群，在拟人化叙事中暗合“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蔬菜谣》以“一菜一谣”的韵律结构，将萝卜、白菜等日常食材升华为农耕文明的诗意符号；《小问号》借“风从哪里来？云向哪里去？”的连环追问，将传统文化中因材施教的理念转化为问题意识培养，更以“长大才能弄明白”的留白式结尾，呵护儿童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转化打破了传统文化教育中教条化灌输的窠臼，建立起“感知—理解—思辨”的启蒙新范式。

同时，该系列绘本独创“唱—读—看一看”四维互动机制，在《小问号》中形成闭环教育模型：儿童通过吟唱感受音韵之美，阅读文字理解文化内涵，观察画面建立视觉记忆，最终在思考中完成文化解码。这种设计弥补了传统文化教育中“重知识轻体验”的不足，使文化认同的生成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建构。其核心价值在《小问号》结尾得到升华——“长大才能弄明白”的并非标准答案，而是永葆对中华文明的好奇与追问勇气，这正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本质要义。

（作者系图书馆研究员、儿童阅读与童书版本研究专家）